

蘇維埃目錄學的幾個問題

弗·奧里謝夫

我們來談談蘇維埃目錄學中幾個具有原則性的問題。

別爾柯夫教授在“文藝理論目錄學新書”(“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及語言學部分, 1956年第6分冊第538—541頁)一文中把整個蘇維埃目錄學, 尤其是文藝作品和文藝理論目錄學, 描繪得非常黯淡。馬楚耶夫在1956年11月25日“文學報”上的論文中也沒有對蘇聯的書目工作做出比較公平的評價, 並且公開地反對推薦書目, 認為它是使“大型”書目落后的原因。馬楚耶夫嘲笑推薦性的原則, 否認挑選和評價作品的必要性, 認為不可能把圖書劃分為“應當讀的”和“不需要讀的”。別爾柯夫教授認為我們“在很長時期內所呈現的目錄學的蕭條狀況, 顯然阻礙了整個蘇維埃科學的發展(着重點著者自加), 在文藝理論方面更是如此”。根據別爾柯夫的意見, 這就是“個人崇拜的特殊後果”。由於個人崇拜而產生的“目錄學蕭條”有時甚至於把他人的成就默認為自己的創作, 並自詡為“新道路的開辟者”。把目錄學看成是“不必要的補充材料或舊習”, 同時認為沒有培養青年目錄學作者, 只是從1954年起情況才開始好轉, 而現在才開始使新書書目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 事實並不是如此。眾所周知, 黨中央委員會於1940年11月通過了一項發展文藝批評和目錄學的具体綱領的周詳的決議, 責成國立列寧圖書館為大眾圖書館編制推薦性書目。

但是, 後來偉大的衛國戰爭阻礙了關於蘇維埃目錄學發展的这个具有真正歷史意義決定的實現。在戰爭期間我們雖然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 但仍然不斷地出版了國家登記書目以及幫助蘇聯人民去戰勝敵人的許多推薦作品的書目, 因此, 目錄學家能夠以自己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沉重而又英雄的年代里得到的勞動成果而自豪。戰後, 書目工作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國立列寧圖書館大大地加強了編制推薦書目的力量。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中央綜合技術圖書館、國立公共歷史圖書館以及許多共和國、省和市圖書館都已經開始編制推薦書目。

目前, 推薦書目, 無論從題目、方針目的, 或所推薦圖書的教育系統性來說, 都不能令我們感到滿意。但事實上, 蘇聯廣大人民所使用的書目已發展到空前的高度。大眾圖書館經常收到幫助它們進行讀者工作和輔導閱讀的書目。雖然許多書目有很大的缺點, 但是任何人也沒有權利來貶低真正的人民目錄學在蘇聯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宣傳政治和科學知識、提高城鄉勞動者生產技能中的巨大作用。

只有一些幼稚的人才認為推薦書目過去阻礙了目錄學的發展。原因不是在這裡, 也不是個人崇拜的影響, 如果問誰有過錯, 那就是那些沒有認真地對待和執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文藝批評和目錄學決定的機關及其領導者。

他們講到目錄學的發展受到阻礙時一般是指的科學通報書目。但是, 為什麼“忘記了”國家登記書目的成就呢? 這是蘇聯進一步開展書目工作的最重要的並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工作, 而且它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做的都要好得多, 這是資產階級目錄學家自己也承認的。如美國目錄學家惠特柏於1953年在“蘇聯國家書目”(Whitby, T. J.: “National bibliography in the USSR”. —Library Quarterly, 1953年第23卷第1期第16—22頁)一文中寫道: “全蘇出版物登記局建立了巨大的書目體系……國家書目出版計劃範圍之大是任何其他國家私營或國家出版計劃所不能比擬的”。“由於建立了呈繳本制度所出版的年鑑的完備性這一特點是其他國家類似的出版物所不可能有的”。

為什麼這些目錄學家沒有看到在他們所謂“目錄學蕭條時期”的年代里我們最大的圖書館——列寧圖書館、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 和全蘇出版物登記局曾進行了大規模編制和籌備俄文圖書聯合目錄的出版工作? 在同一時期內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還編制了書目之書目和革命前的期刊目錄。

我們應當指出: 別爾柯夫教授所參考的在“目錄學蕭條時期”所編制的許多書目正可以證明目錄

學的發展已進入了新的階段。例如，1952年及1953年所出版的馬楚耶夫的兩卷集“蘇聯文藝書籍與批評”，1951年（1949年以後）和1952年（1950年以後）出版的“普希金名著書目”。1944至1947年（第1版）和1951年（第2版）出版的茲多布諾夫的“俄羅斯目錄學史”，以及1950年出版的第1版卡烏弗曼所著“俄羅斯目錄學和目錄學辭典”。這些都證明別爾柯夫教授的論點是不符合事實的。

別爾柯夫說的很正確，文藝理論書目的現狀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他把這種情況稱為“目錄學蕭條”這是完全不正確的。不能不看到整個蘇維埃目錄學和文藝理論目錄學方面的成就。甚至外國也都承認蘇維埃目錄學的成就。例如，羅馬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科技文獻中心的工作人員——薩斯卡羅，於1953年評價蘇聯國家對目錄學發展的影響時認為，由於蘇聯在書目工作中吸收了許多專門機關和專家，因此保證了書目的高度的科學質量（Sascaro, G.: “La Documentation dans l'URSS apre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Revue de la Documentation, 1953年第20卷第3期第123—124頁）。

蘇聯有五十多個單位進行着有計劃的科學通報書目工作。在所謂“目錄學蕭條”時期建立了出版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文摘的專門的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社會科學基本圖書館系統地出版有哲學、經濟、歷史、考古學、人種學、文學理論、語言學、東方學、斯拉夫學等二十多種科學通報書目。

專科目錄學還沒有被提到相適應的地位，它還落後於科學和生產上的要求。但是它並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動，而是不斷地前進着。在戰後時期出版了關於自然科學史、數學、地質學、化學、核子物理學、半導體、音響學和無線電波傳播的基本書目，並出版了一些有關工業學科的書目（如煤炭、漁業、環璦路——造紙、冶金等）。

在生產技術通報方面廣泛地編制了重要而又具有現實性的專題索引。同時，還出版了一些醫學上重要問題的大型索引。

別爾柯夫教授說“沒有培養青年目錄學工作者”，這更是不正確的。在戰後的年代里，列寧圖書館、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歷史圖書館、共和國圖書館和省圖書館、專業圖書館和其他圖書館里曾培養了一批青年目錄學

家。圖書館學院和高級圖書館訓練班也不斷地培養新的目錄學幹部。當然，脫離實際的人是不會指出這些事實的。

目錄學家稀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有大批書目專家從事編制書目索引工作，他們的責任是：保證書目的高度思想水平和科學水平。在編制文藝書籍書目和文藝理論書目方面也是如此。

蘇維埃目錄學一直是不斷地前進着。但是各種和各學科的書目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為了使蘇聯的各種書目都獲得迅速的發展，必須建立書目工作的統一制度，制定目錄學發展的國家計劃，並保證其實現。

論目錄學工作中的党性原則

党性是蘇維埃目錄學的主要原則。特別是在共產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更加尖銳的時候強調這一點更為重要。我們是那些企圖用謊言和捏造來迷惑勞動人民為垂死的帝國主義服務的抒情詩人的見證人。他們企圖延長資本主義毀滅的時間，削弱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爭取解放的鬥志。最近新出現的修正主義在這方面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

資產階級思想也流入到社會主義陣營並影響着部份政治上不穩定的人。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並把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鬥爭貫穿到我們各種思想工作的一切環節，一切方面中去。

在目錄學中也同樣有尖銳的思想鬥爭。蘇維埃目錄學是在捍衛馬列主義思想和黨性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與那些反對在目錄學工作中採用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的人進行了嚴肅的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在這個鬥爭中曾粉碎了資產階級目錄學的偽善說教者的客觀主義；他們否認党性，否認評價和宣傳出版品的階級觀點。我們曾堅決反對了把目錄學只看做簡單的圖書統計，和登記的謬論，揭穿了那些不正確的觀點即反對把目錄學看做是對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有力武器，做為提高勞動人民政治、文化和生產技術水平的方法的觀點。並指責了那些不懂得革命前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的庸俗目錄學家的意見。

蘇維埃目錄學成功地克服了違反教育學的要求並脫離讀者的教條主義的錯誤。但是，目前我們在

目錄學中又發現了資產階級新的客觀主義和形式主義。這就是要求書目所包括的內容要詳盡無遺。似乎這就使書目具有高度科學性了。這個觀點的擁護者反對從思想性的觀點上挑選和評價出版物的必要性。他們認為讀者應當自己挑選和評價圖書。

蘇維埃目錄學的任务乃是積極宣傳有助於共產主義勝利的出版物。蘇聯的目錄學家不能，也不會推薦那些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工人階級專政及其政党的反動出版物。

党性原則並不排除完備地挑選對於科學和生產活動有着現實意義的作品。但是它要求我們查明書籍的科學價值、現實性和歷史性意義，並用批判的態度對待每一種書。在書目的提要中要指出每種出版物的特點。

內容“詳盡無遺的書目”是違反党性原則的。因為它要求在書目中介紹全部出版物，甚至也包括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書籍。著名的蘇聯目錄學家托波夫斯基認為這個要求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幻想。甚至外國資產階級目錄學家也認為它是不必要和沒有什麼意義的。

書目中只需要包括那些具有某種程度的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出版物。蘇聯的目錄學家正是這樣編制書目的。同樣，也是根據這個原則來編制俄文書籍的聯合目錄。編者在書目中絕對不放進沙皇時代的、黃色的出版物以及有關神秘學、手相術、占魂術、寺院和修道院所謂“為人民”出版的宗教信仰等書籍。任何一個蘇聯人都知道根本沒有必要利用書目宣傳反對蘇維埃國家制度的有害的書籍。

舊版本書推薦書目（按知識門類或各個主題所編制的），所包括的範圍是對科學或生產有意義的、有關該問題的書籍，這些書籍甚至是以不正確的立場、方法寫成的，但是包含着重要的事實資料或者向科學工作者介紹反映科學發展某一階段的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和觀點的。目錄學家的任务在於通過分類和提要對這些出版物給以正確的、馬列主義和科學的鑑定。

推薦書目在公共圖書館已普遍採用。成千上萬的讀者廣泛地利用着它們。對書目參考資料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由於大規模地建立了學校、高等院校和訓練班，因此，某些目錄學家就忽視了自學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人民普通文化水平的提高更促進了千百萬羣眾對於知識的要求。從任何一個學校畢

業都可使人們走向新的、科學的頂峰，在社會主義勞動組織條件下，生產活動本身就促使着工人、職員、集體農莊莊員經常不斷地渴求新的知識。

推薦書目對宣傳員、鼓動員、報告人和講演員也有極大幫助，因為在廣大勞動羣眾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就必須經常熟悉新書。

此外，大學生、各種訓練班學員、中學生和教師們也經常向我們的圖書館提出要求。

這一切都說明需要進一步發展和改進推薦書目。

因此，我們不能同意馬楚耶夫輕視推薦書目，認為不可能和不需要推薦最好的圖書的意見，他根本不關心大眾圖書館里那些需要幫助的許多讀者。要知道，甚至對大學生——未來的文藝理論家們也不能輕易介紹他們閱讀托爾斯泰全集，更不用說關於托爾斯泰的著作。如何對待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希望了解偉大俄羅斯作家創作的讀者呢？誰來幫助他挑選關於托爾斯泰的許多真正值得閱讀的書籍，小冊子和論文呢？

當然！蘇維埃目錄學是不能按着馬楚耶夫的意見發展的。我國目錄學最重要的任务是對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宣傳政治、科學和技術知識。不錯！我們的推薦書目還有許多缺點。這是必須克服的，但是，要記住：推薦書目是為共產主義思想而鬥爭的羣眾性的武器。

論蘇維埃目錄學的对象

直到現在，在目錄學家中還進行着關於目錄學的內容及其在其他科學中的地位之爭論。近來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把目錄學人為地分為兩部分：在理論上它的对象是研究書目資料，而在實踐中是編制書目資料。根據若干目錄學家的意見，做為科學的目錄學的任务是：發現並論證目錄學發展的規律性，制定書目編制的方法等。這個主張的擁護者所打的旗幟是建立新的科學——即建立一種不同於一般書目的高級目錄學。

許多同志（例如維契什科夫）認為書目工作的真正主要的对象不是書而是讀者以及讀者的要求（見“蘇維埃目錄學”第44期第41頁）。為了確定書目的目的性及有效地利用它而對讀者進行研究是目錄學最重要的一個方面，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目錄學的任务是研究讀者閱讀書籍。脫離圖書，尤

其是把圖書和讀者對立起來看待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是對於目錄學的發展不利的。

目錄學是屬於科學活動領域之內的一門學科，為了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和科學、文化的發展以及勞動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用它特有的方法來揭示各類知識的人類的圖書財富。書籍的研究、挑選、評價和分類，這些書目工作上的方法都是目錄學科學活動的方式。因此，要求目錄學家對於他所從事的知識部門要非常熟悉，並要不斷地提高業務，豐富書目工作的專門知識。

目錄學“是任何一種學科和任何一種專門教學對象的一個組成部分”（見特羅波夫斯基在1936年12月15—27日的圖書館學和目錄學理論問題討論會上所做的“關於蘇維埃目錄學的基本問題”的報告提綱）。但是，這並不排除，也不反對目錄學有它的原則、體系和方法，而且肯定了做為一種科學的目錄學本身就包括着書目工作的原則、體系和方法。

不能把目錄學的理論和實踐、目錄學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分隔開來。這樣，就是把那些在研究讀者的基礎上進行圖書挑選和評價並系統地推薦教育讀者閱讀的真正科學工作的目錄學家降低到經驗主義者——盲目實踐者的水平。這些所謂之理論家甚至沒有接近過圖書和讀者（認為這是實踐者的事），為了尋找目錄學發展的規律性而在一味地研究書目。實際上，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尋找到這種規律性。但是，根據別爾柯夫教授的意見，這會在將來做到的（見梭古羅娃：“1700—1955年在國內出版的俄文書籍普通目錄學”中別爾柯夫的序言）。

我們認為，由於過度地追求目錄學發展的內在

規律以至於使我們看不到蘇維埃目錄學真正刻不容緩的需要，首先是離開了擬定書目的方法，離開對書目的讀者用途和對各種書目的使用問題的研究。

有誰對編制出的書目進行過查對和研究過圖書館員和讀者對這些書目的利用程度呢？為什麼書目的編制方法及對書目效果的檢查，不是由那些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去研究，反而交給那些不進行實際工作的人去研究呢？顯然，想把目錄學分為理論和實踐兩部分，這只是一種空想，是徒勞無益的。

不能把目錄學和相應科學的目錄學對立起來。特羅波夫斯基說目錄學將成為任何科學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它是任何科學研究工作所必要的階梯。

目錄學的發展和方向不是取決於某些目錄學家徒勞無益的企圖尋找“內在規律”，而是取決於國民經濟、科學、文化以及對人民羣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它和共產主義建設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為國民經濟、科學、文化服務，為共產主義教育，以及為在蘇聯人民的意識中培養共產主義思想而進行的鬥爭，——所有這一切就是蘇維埃目錄學發展的基礎。

換句話說，蘇維埃目錄學發展的目的、任務和途徑是由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在共產主義建設、對羣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方面所規定的政策而決定。

書目主題及其內容的規定應當建立在科學、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的基礎上。

（萬培梯譯自“圖書館員”雜誌1957年第10期，韓維校）

從一些統計數字來看八年來的書目索引工作

李 鍾 履

書目和索引可以幫助科學和建設工作者獲得必需的圖書資料，可以指導廣大讀者閱讀優良讀物，可以便利圖書館、資料室、圖書出版和發行單位以及其他機構進行各項工作，所以它們是非常重要的參考工具。

解放後八年來，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大力支持下，圖書館事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書目索引工作也得到了空前未有的發展。根據北京圖書

館的調查，截止1957年底，全國各類型圖書館已編有單行本書目索引2,364種。這個數字不僅大大超過了任何一個反動統治朝代，也壓倒了全部反動朝代所編書目索引數的總和。△

為了使讀者進一步了解解放後書目索引的編制情況和作為本文評述的依據，現在列幾個統計表如下：